

“辣妈”时代的母性

吴华眉

(复旦大学 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 200433)

摘要:传统母亲身份既受到父权文化的大力讴歌,也是女性遭受否定和贬抑的原因。当下辣妈形象的张扬体现了评价母性的生存标尺的转变,但其并未突出主体的自由和个性,而使得母亲身体的呈现与消费文化的规训话语紧密相连。母性身体的这种话语演变,是女性主义质询和批判的重要领域。为了避免身体的主体性价值在不适当的抽象概括中被耗竭,应反转母性,挖掘母性体验所带来的女性身体体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鼓励女性在对世界的主动参与中注重身体自我的引导,改变对女性的工具化,重塑女性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辣妈;母性;消费主义;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6-0082-07

母亲身份作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支撑着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母亲却总是被保留在需要的维度。如今,围绕母亲的角色出现了“辣妈”这一个性张扬的新概念。在百度中输入“辣妈”一词,会跳出8640万个搜索结果。各种辣妈圈、辣妈学院、辣妈商城、辣妈秀赚足了人们的眼球。百度百科这样对辣妈进行定义:辣妈是互联网新生代网络名词,一般指身材火辣、个性独特的年轻准妈妈和妈妈们的代名词。在2013年底新浪网友自发组织的辣妈大赛中,网友普遍认同像已有3个女儿的明星演员钟丽缇那样“有事业、有女人味、有火辣身材”的妈妈,是当之无愧的充满正能量的新时代辣妈代表,也是普通年轻妈妈们的模仿对象。

一、母亲身份

毋庸置疑,辣妈首先应是“妈”。父权文化中,由于女性的生育能力保证了男性世系乃至整个父权制的延续,女性身份因而总是被与母亲身份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母亲才是女性有价值的命运,一个拒绝接受母亲角色的女性将面临不为社会接受的危险,女性也通过这种将其与其身体束缚在一起的方式得到控制。与依据女性的生育年龄而划定年龄界限的饱受嘲笑的“剩女”相比,“辣妈”所依附的母亲身份无疑是辣妈形象光彩夺目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母亲身份”,艾德丽安·里奇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一书中曾在两种意义上予以正确说明:其一,母性是女人与其生育能力和孩子之间的潜在关系;其二,母性是为女人被男权掌控提供保证的习俗制度。里奇同时指出,母性的后一种意义是叠加在第一种意义之上的,父权社会中作为习俗的母性压抑和削弱了女性的发展机会和创造潜能。^[1]

在象征意义上,父权社会将习俗的母亲形象想象为作为人类情感归宿的“故土”和“家园”的形象。的确,当我们脱离母亲温暖子宫时,我们必须去重新寻找新的确定性以安置脆弱的身体和终有一死性。在

收稿日期:2016-04-3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女性身体观研究”(13DZXZ01);第5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吴华眉(1980-),女,山东济宁人,复旦大学哲学流动站博士后,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男性对故土家园的不断伤逝和找寻中,他们以乡愁的名义永不满足地获取和累积更多的财产,又随时满怀乡愁地希望在女人/母亲身上重回他们失去的故土家园。在此性别结构中,女人被地点化、空间化,被钉在文化地形图上固定的地理位置。这一地点就像柏拉图在《蒂迈欧篇》描述的“宫籁”(Chora)。“宫籁”被类比为如母亲的子宫般的容器,这一容器是远离可感和可理解世界之外的无法描述的神秘场所,却提供了可感和可理解世界的起点,它本身没有任何内容,却始终接受着一切,从而仅具有工具和途径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艾莉斯·马利雍·杨说道,“在父权的性别基模中,女人被当作建造的物质,也被当作男人栖息于内之处。他之所以成就自我确认的主体性,是因为有她既作为他创造力的来源,又作为他藉以看见自我反映的产物,来支撑并补足他的存在。”^[2]

因此,在这种通过外在补足以建立自身的男性思维中,从未想过女性亦是有自己的认同与需要的主体,而将充当“家”的母亲视为了其彻底的私有财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对母亲的认识上。首先,传统的母亲虽被寄予了繁衍和丰饶的希望,却被认为不应该有性的欲望和需求。身为母亲的女人就这样被分裂开来,既如同女神,又身为奴隶。被切割过的母性却又被和处女的形象想象性地缝合,以规训女性的行为。作为宗教女性典范的圣母的身体即是这种想象的结果。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履行女性的生育功能,但受孕生子的圣母依然是处女之身,并远离不洁之性的污染。在这里,经由对“令人厌恶”的身体的排除,女性仅作为母性的升华被迎入文化中。一个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母亲的身体应该是属于子女的,她不应该有丰富多样的自身生命需求,当然也应该熄灭内心的爱欲之火。“圣洁的母亲”永远是男权社会讴歌的主题。其次,毫无私欲的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又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职业成员。^[3]母亲的家务劳动是没有薪水的,照料和打扫等零碎琐事是其一层不变的工作内容。一周工作七天,24小时随叫随到。无论是全职妈妈还是职业女性,女人都要用家务来表明她的有用性,证实她的本分和无可非议。然而,家庭主妇如西西弗斯般“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在维持现状。”^[4]极端琐碎的、非生产性的家庭事务的压迫和窒息“使她们愚钝卑贱,……消耗着她们的精力。”^[5]总之,父权制的母亲滋养生命,抚育子女,而其本人却仅是孕育生命的容器,是等同于物质的存在。她应该全然付出,而不该有丝毫个人的希求,“给予”是其存在的全部理由。

母亲的牺牲和给予特质一直以来受到父权文化的讴歌,他们把母亲推向神坛,“想象成奉献慈恩的发光体,而这个来历不明的发光体,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死亡,或者说死亡意象构成了‘母亲’处境的全部,这是献祭的必然结果。祭品的本质是‘物’,她不能发声,外在的光晕和内部的漆黑形成尖锐对比。”^[6]因而,作为“内部空洞、漆黑的祭品本身”的母亲身份实际上是女性遭受否定和贬抑的原因。男性一生都在否认其“生于女人”这一事实。在古希腊,男性为了稳固其支配地位,创造了自体繁殖的神话来否认女性生育的价值。古希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就不是在黑暗的子宫中发育,而是诞生自宙斯的头颅,因而阿波罗指出,女人可能是孩子的母亲,但男子才是真正的生育者。有父无母是可能的。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断言,心灵受孕是高级过程,可以制造不朽之物,肉体受孕则是低级过程,不过是一种重复轮回。“只有男人的身体才具有生殖力,他们到女人那儿去生孩子”^①。这种阐释在许多古希腊哲学家中获得共识。他们普遍认为,女人是无能的畸形人,是一个不生育的男子,母亲只不过是存在的土壤,包被的外壳或空洞的容器,她不是作为一个共同的生产者与男性并列,而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渺小而卑微的存在,只有在男人的精子中才具备孩子所需的全部特质,男性才配享生殖和运动的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指出,母亲仅提供无定形的和消极的“质料”,这些质料必须通过父亲被给予“形式”。在此基础上,笛卡尔以

^① 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借第俄提玛之口指出,身体方面生育欲旺盛的人通过接近女人这种方式生育子女使自己永活,灵魂方面生育欲旺盛的人通过触动美人而让自己孕育已久的灵魂受孕、分娩,并断言,凭灵魂生育优于肉体生育。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等. 柏拉图的《会饮》[M]. 刘小枫,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86-88.

来哲学家们更是通过二元论将身体分裂为肉体和精神，并将遭受贬抑的肉体划归女性。在他们看来，由于女人的生殖功能和智力无法共容，其全部能量都需用到生育过程之中^[7]，因而，女性无法拥有不朽的精神，一片混乱的脑子无法理解“天才的书”^[8]，以致到了黑格尔仍断言，女人天生不配从事较高深的科学、哲学研究和进行某些艺术创作，女人若领导政府，则国家将有覆亡之虞。由此，被排除在生产创造之外的女性就这样默默地成为了男性统治的“构成性外在”，被组织在了父权理性之中，维护着男性统治。

综上所述，母亲的身份并未赋予女性以权力，而是使其边缘化，“传统的母性思想要求女人的‘天性’，而不是智慧；要求自我忘却，而不是自我意识；要求依靠他人，而不是创造自我。”^[9]正如伊利格瑞所言，整个人类文化不是基于弑父，而是基于杀母，把母亲从权力中心驱逐，压制母亲的欲望，把母亲象征性地贬低为肉体的、物质的东西，最终通过谋杀母亲来维持男性统治秩序。

二、消费主义的盛行与辣妈身份

长期以来，处于人口的再生产之工具地位的母性保证了父权制的存续，人们讴歌母亲，使其不同于“处女”“妓女”，从而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然而，“辣妈”一词的出现改变了这一传统的母亲形象，新时代的年轻母亲不再是“纯洁”和“无欲”的化身，而成为上文所述的“有事业、有女人味、有火辣身材”的形象。

人们普遍认为“辣妈”一词主要缘起于人们对英国歌手辣妹维多利亚的一种昵称，性感辣妹在和贝克汉姆结婚生子后自然升级成辣妈。2005年以来，辣妈称号普遍进入女明星群体。在娱乐新闻中，一个个花样性感辣妈们不断出场：小S、钟丽缇、王菲、孙俪……她们不仅完成了做贤良母亲的父权指令，具有对孩子的满腹柔情，而且具有惹火的身材、蒸蒸日上的事业、hold住老公的性感容貌等。一时间，这些明星辣妈们突破了传统贤妻良母的想象，其成功女性的形象似乎充满着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将母权和强调自主权力的女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此背景下，“纯情玉女”已不再是女明星们所力图打造的形象。盛大的婚礼、御夫的秘技，拼娃、晒娃的资本则成为她们津津乐道之事，一个性感而又生养多个萌娃的女星更会圈住无数粉丝，拥有更好的事业前途。

根据调查，从2007年开始，辣妈一词便在继续迅速传播流行的过程中开始了词义内涵的拓展和演变，“出现了两种演变趋势：一是从明星辣妈逐渐走向平民辣妈；另一个趋势在内涵上从外在的强调逐渐泛化到了各种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上。”^[10]翻开林林总总的“辣妈”网页，在辣妈社交平台中，时尚购物、整容瘦身、育儿美食、夫妻、婆媳情感、打击小三成为辣妈达人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在辣妈商城中，进口母婴特卖、护肤品、海外直邮进口奶粉、进口纸尿裤则是其主营范围。不难看出，辣妈的涵义也在两方面凸显出来。一方面，走在时尚前列，具有成功的事业和凹凸有致身材的是“辣妈”；另一方面，遵从母亲的角色，发扬以孩子为中心的传统的母亲美德也是辣妈的应有之义，正如新时代网络红人辣妈点点所言，辣妈“不仅要有辣妹的气质，也要有妈妈的温柔”。

就辣妈的第一层要义来说，时尚、性感和成功代表着身为母亲的女性身体在广告和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资本化的运作方式渗透到中国市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市场产生了重大冲击。消费主义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商品所代表的符号象征价值亦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一切纳入消费之中，人的身体概莫能外。其中“女性身体”则是人们“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所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的消费品”。^[11]全部时尚和广告都要求女性负责自己的身体，开发它，向它投资。为了取悦于男性的视觉文化，女性将身体作为资本来实践的行为方式随处可见，她们根据时尚符码所命令的标准施于自身，开发身体的性感部位。应该看到，人们对身体的这种重新占有与消费，并不是依据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依据由美与色情的符码所提供的消费娱乐原则，这一原则标示着：“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之物，成为纯粹的自然

之欲和可身心分离之物。在这种市场原则过分地扩大化中,身体的灵肉统一性向功用化了的性的交换价值蜕变。这正如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言:“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满足于将身体仅仅作为一种劳动力来剥削,而是试图分解它,将身体分裂为劳动中的身体、交换中的身体以及游戏中的身体,并将所有这些对于身体的描述整合为一种作为个体需要的身体,即作为一种受自身控制的生产(消费)力的身体”。^[12]在这种被碎片化了的身体理念中,女人的身体作为性资本被最大限度地身体化了,“母亲的身体”中的“妻性”内涵亦作为身体的性解放符号被重新发现和开发利用。“辣妈”形象的流行正是在这种重新的开发和利用中,将女性身体从“实用的”母性身体向“审美化的”公开的身体转变。这种“美丽的”转变所希求的身体实则是由一般化了的符号交换价值所生产的身体效益。在其中,符号将身体完美化为一个物,女性的身体屈从于一种规则,屈从于整个符号的流通,仅作为美丽和快乐的符号和展示者,而最终失却了身体的灵动本性。

就辣妈的第二层要义来说,现代社会中,女性虽作为工薪劳动力进入公共领域工作,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划分仍是泾渭分明,女人则天生属于社会生活给她们安排好的家庭主妇的位置,相夫教子、装饰整理才是其不可推卸的分内之事,成为母亲才是女性的完成状态。这种性别二分法在消费文化中更是得到强化,如在消费广告话语里,家用电器、厨具、方便食品等家务用品的购买与使用都是为了减轻妻、母的负担。在目前一则让人颇感讽刺的广告里,一对父子买了某品牌的油烟机给正在烹饪美食的时尚辣妈,油烟机高档高效,儿子搂住妈妈的脖子,温情而自豪地说,作为家里的男人,我们应该守护她的美丽!不难理解,正如历来对身体的压抑总是和对女性的剥削紧密相连,当下的市场原则更是充分利用传统性别体制以保证资本的增殖。当这些照料工作都编派给女性,女性远离权力和权力的行使与制定也就成为必然。传统的贤妻良母并非真的过时了,新时代的辣妈们在外表光鲜的背后更加辛苦和操劳。合格的辣妈被要求“美丽与孕产”两不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当面临着事业和家庭两手都要硬的规训时,她们承受着加倍的劳累之苦和自身巨大的心理压力。

美丽而能干的全能辣妈似乎是新时代女性的标兵。然而在所谓新时代的辣妈中,女性并未收回自己的同一性,而仍作为男性之间交换的对象,我们并未看到“为自己而活”的独立自主的形象。辣妈们貌似可以继续风情万种,性感妖娆,追求女人风韵,颠覆传统母亲形象,但外表的出位只是为了满足消费社会的需要,颠覆只是表面的。身为辣妈,必须明确的是:相夫教子的传统母亲定位是绝对不变的。当代辣妈“美丽身体的解放”和“贤妻良母”貌似完美的结合正是消费主义和传统性别体制结合在母性身体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辣妈形象的出现不但没有彰显女性主义的进步意义,而且落入母权和男权的窠臼,成为束缚女性的新枷锁。大众文化中的辣妈依然活在男权的目光中,当社会经济文化价值对身体的诉求与想象都镌刻于母性的身体之上时,更增加了对女性苛刻、矛盾的要求,使其身体在被切割和重新缝合后遭受双重的物化,而身份政治中的女性公民角色却从未出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也只是在夹缝中求生。

三、新时代母亲的主体性重塑

母亲身份一贯是女性主义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各类派别的女性主义都曾激烈地批判过父权对母亲身份的压迫。然而,问题是,“当身体的有限性使得主体注定要在并非由她自己所创造的范畴、术语和名称中,去寻找对它自己存在的认同时”^[13],当评价母性的生存标尺伸展到人的身体最深处,把女性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间离中时,该如何恢复母亲身体的政治性呢?

应该看到,成为母亲的女性,尽管在母性的社会象征背景下养育孩子,她们仍是独立的。对于在世活动的身体存在来说,规范的内化总是会留下压制、冲突和矛盾的裂痕,即使母性的真实体验在父权社会中

遭遇着被消音的命运,但母性的身体体验所带来的女性自身体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总是真切地存在着。若挖掘这种自我和规范之间所形成的具身性关系依然具有改变现实的潜力。因此,从母亲身份中解放女性,“用母亲白色的乳汁”^①来书写母亲的历史,反转“母性”是我们不可缺少的解放之路。

事实上,一些女性主义者曾从女性怀孕、生育和育儿的体验中去分析过母亲身份中所蕴含的主体性体验。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用“原初母性关注”的概念来形容母亲的孕晚期心理状态。认为在这一时期,母亲自身的主观性、利益、节律以及所关注的事物都统统退后,而母亲自己的动作、活动乃至生存本身都用来满足胎儿的需要。艾莉斯·杨在《怀孕的肉身化》一文中将怀孕的母性这种“为他存有”的体验模式视为“去中心化的身体主体性”的肉身化模式。她认为,在孕妇的孕育体验中,身体的扩展带来了另一个身体的出现,自我的内部和外部变得模糊不清,自我与他人紧密相联。当胎儿初次活动时,孕妇也许会产生自我内部划分的微妙感觉,但是这里的“自我的内部”既是“自我的他者”,也是自我本身。从而,孕育的经历使母亲对自我与他者、与世界之间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体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特娃指出,母亲正是在这种再生产的社会活动中,“导入了妊娠的那种自然的鼓动、分娩的那种‘头晕目眩闪光’以及侵犯母=子境界的眩惑的游戏”。^{[14][32]}孕产经历中这种模糊的感受和极限的体验,带来的是“自我与他者、自然与意识、生理学与语言的分离与共存”。在这种肉身体验中,女性“既被身体与语言、符号态与象征态撕裂,又接受对方”^{[14][32]},惯习的身体和此刻的身体之间的连续性破裂了。

根据母亲的身体体验,克里斯特娃还分析了母性时间和母性语言。母性时间是指女性根据具有周期性的月经、妊娠、哺乳等身体体验的节律来纪事的时间。这种时间是可逆的、圆环性的,与男性之不可逆的、继起的直线历史时间相对。这种日常生活时间是循环性的,举扬回归和开放,不同于男性崇尚的物理时间的封闭性和单向延续性。对于母亲来说,贯穿语言和社会的线条性时间与充满自然节律的圆环性时间在母亲的身体中相互交错。这两类时间的共存将成为女性快感和魅力的源泉。关于母性语言,克里斯特娃指的是在母亲与其咿呀学语的幼儿之间互通的语言。她发现,母亲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也是在向异质的他者敞开,敞开中被浸透的他者与其语言将不再继续保持完全的同一性,从而,母亲教孩子学说话的过程成为母亲语言再学习的过程,这种不断地重新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也可以使母亲“不断地将自身提升到新的高度,使自己脱出原来的主体的约束”^[15]。

不难看出,在怀孕和分娩的肉身体验、母性时间、母性语言中,形成了一个母性的空间,在那里母亲在与孩子的共存中体验自我的独立与成长。当个人的自由得到实现时,此空间中的母爱将是创造性的,而不会是对孩子的控制与支配。母亲自身的自由体验将使其具备爱的能力以帮助孩子自由地面向世界,并在孩子的自由成长中感受她的快乐。西克苏将这种母性空间称之为“力比多经济体系的礼物领域(the Realm of the Gift)”,并将其与男性力比多经济体系的“专有领域”(the Realm of the Proper)相比较。她认为,“专有领域”标志着对自我身份的强调,其体现着一种自我扩张和傲慢统治。在专有领域里,礼物的馈赠被认为会造成权力的不均衡,被视为微妙的侵略手段,而“礼物领域”则愿意“被他人所穿越”,它以给予为特征并向差异开放,是一个将快感和与他人亢奋互换的解构空间。^[16]由此,西克苏指出,女性是爱的给予者,是为了他人的“所在”,她爱自身并以爱来回报她所生自的身体。她哺育儿女、反对分离,她的力比多将对政治与社会产生彻底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怀伦理学家研究了母性的关怀性、宽容性、温和性和创造性及其意义。内尔·诺丁斯认为,在解决道德问题时,相比男性,大多数女性更注重情感、感觉、体验和他人的需要。卡罗尔·吉利根(Garol Gilligan)将母性的这种特点称为与基于原则和逻辑的

^① 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克苏在20世纪70年代强调女性身体写作时,提出“用母亲白色的乳汁写作”来肯定和赞美母亲的身体体验。

“公正”所不同的“关怀”的声音，在其代表作《不同的声音》中，她建立起以女性的“关怀”道德体验为基础的关怀伦理学。更有一些关怀伦理学家则把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模式，提出关于“母性人格”和“母性思考”的问题，呼吁用母爱式的关怀来创造一个和平的新世界。与此相呼应，西美尔指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女人生活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性中，生活于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17]。

但是，应该明确，母性空间的自由和包容并不意味着育儿和家务都应全部编派给女性，如果将照顾任务仅分配给母亲，在单一的母性照料中，孩子的驱力便只是与母亲的互动而形成。当父权养育文化的极端把女人塑造成毫无自身希求的形象的同时，也会催生一些“恶母”形象的出现。因为，当女性只能依托孩子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时，照顾和入侵的界限将逐渐模糊，受虐和施虐将互为因果，母亲的权力便难免变成一种钳制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母性的空间将受到极大挤压并会扭曲变形，母亲的单一抚育只会给子女带来伤害性的后果。而就现代社会的母亲来说，当其既承担公共领域的工作的压力，又深受无条件“母爱”的刻板印象折磨时，其与自身身体的非连续状态和其母性空间的有限性可想而知。

事实上，当下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传统的纯粹牺牲型的母亲，还是当下集“热辣”与“温柔”于一身的新时代辣妈，身为母亲的女性都只是在一种工具化的意义上被使用，其身体体验所带来的创造潜能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处于被贬抑状态。这种母亲的价值极度被轻视的效应深入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孩子寻求个体化的道路中，他（她）内在的心理结构和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就会摒弃对母亲最初的依赖和认同而转向拥有权力的父亲，以寻求外界的接纳，追求自由和力量。但当将个体将认同全部转向父亲时，在这种西克苏所谓的“专有领域”中，我们又会发现，父权社会的父亲们将“自我满足以及独立于所有他者和异己”作为主体自由的唯一保证，他们与其他人联系的方式就是“按照主体真正得到并且和自身统一作为标准，并以此来计算损失和依赖”^{[18][356]}。这种认为“拥有自我就是自由”、拒绝依赖、排斥他者的自由中的主体无疑是一种传统二元体系中的绝对主体，这种至上的主体只会将对他人的依赖转化为控制，从而既无助于自身自由的获得也将阻碍他人自由的肉身化实践。

对此，杰西卡·本杰明在《自我的欲望》一文中提出了“主体互涉”这一新的心理结构模式。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的养育模式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象征性自我模式，这种模式“将父亲作为分离的工具，以及将父亲看作是代表了力量和欲望的阳具进行内在化处理”^{[18][371]}，强调拒绝相互联系的男性经验，忽视母性经验的自由潜能，将女性置于纯粹客体这一被动位置之中。他宣称，主体互涉模式不同于这种排斥他者的模式，是一种新的性别认同理论。这一模式质疑父母分工中养育和与自由的分裂，将父母双方都认同为欲望的主体，并强调这两种主体的相遇和相容，其中令人兴奋的父亲可以为孩子提供赞赏和认同，展开怀抱的母亲可以为孩子带来体验真实内心欲望的空间。可以看出，在本杰明所谓的这种主体互涉的模式中，一方面这是日常生活中对母性身体真实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肯定和微观政治实践，在这里，孩子的成长不再需要摒弃与母亲的分离，因为母爱并非是对自主的钳制，自由也不再被理解为单一的自主。女孩也将不再遭受认同的困境，而是充分发展自身的欲望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在发挥母性空间所蕴含的自由内涵的同时，主体的互涉也为孩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身体体验可能，使其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成长的生命体验，这是牺牲的母亲和新时代的辣妈都无法单方面给予的。

当然，应该明确，本文中强调母性经验的重要性不是无视女性经验的多样性而寻求“女人”的单一经验，也不是将女性的潜能限制在所谓的“关怀本性”范围内，更不是说没有母性经验的女性就不是“女人”。否则，当女性被塞入母性的尺度当中，女性话语被母性话语所覆盖时，现实中女性身体的内在差异将被“以母性-妻性-女性的价值序列为特征的母性文化”封锁，制造出来的抑郁、可疑和不幸的“剩女”，而且，当消费主义和母性尺度相互交错，看似革命性的“辣妈”也会成为高度形式化的可订造之物，再也没有了活生生的人，只有符合母性尺度的物和符号社会所需的消费品。因此，这里只是讨论了女性身体解放的一

个范例,而不是重新陷入了关于“女人天性”的本质主义生理决定论。

总之,通过反转母性,一方面鼓励活生生的个体注重身体自我的引导,将个体建构成以伦理行事的行动者,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既有的规范,在对世界的主动参与中对自我的存在意义负责。另一方面,通过反转母性,在对母性的重复和移植中改变对女性的工具化,使充满丰富差异的女性呈现。这样一来,真实的身体和欲望“就从原来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逻辑框架中解脱出来,也从充满暴力潜能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转化成为有利于创建人类生命体本身的不断更新以及社会不断创新的仁慈生命力。”^[15]

参考文献:

- [1] RICH Adrienne Cécil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5:13.
- [2] 艾莉斯·马利雍·杨. 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M]. 何定照,译. 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7:217-222.
- [3] 芭芭拉·R·伯格曼. 家庭主妇的工作[C]//詹妮特·A·克莱尼,等. 女权主义哲学. 李燕,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272.
- [4]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515.
- [5] 凯瑟琳·A·麦金农.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C]//佩吉·麦克拉肯·刘莉,等译.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
- [6] 张念. 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J]. 天涯,2004(1):41-44.
- [7] 克莱尔·汉森. 怀孕文化史[M]. 章梅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
- [8] 苏珊·布朗米勒. 女性特质[M]. 徐飚,朱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6.
- [9] 艾德丽安·里奇. 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女性[M]. 毛路,毛喻原,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7.
- [10] 沈奕斐. 辣妈. 个体化进程中的母职与女权[J]. 南京社会科学,2014(2):69-76.
- [11]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3.
- [12]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84.
- [13] 吴华眉. 女性身体的异化[J]. 广西社会科学,2015(6):49-53.
- [14] 西川直子. 克里斯托娃[M]. 王青,陈虎,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15] 高宣扬. 论克里斯托娃的新女性主义[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9-18.
- [16] 陶丽·莫依. 性与文本的政治[M]. 林建法,赵拓,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146-149.
- [17] 秦美珠.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93.
- [18] 杰西卡·本杰明. 自我的欲望: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与主体互涉的空间[C]//佩吉·麦克拉肯·刘莉,等译.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Motherhood in the era of Hot Moms

WU Huame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motherhood is highly praised by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at's why women suffer from disavowal and discrimination. Nowadays, the present of hot mama image does not fully show women's freedom and individuality. Female subjectivity is depleted due to the commercial markets using "hot-mom" as kind of promotional tool. To make a change, we need to reverse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so that women can rebuild their subjectivity.

Key words: Hot Moms; Motherhood; consumerism;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黄仕军)